

唐璜

[英]拜伦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拜伦著

朱维基译

内 容 提 要

拜伦是英国十九世纪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的伟大代表人物；《唐璜》是拜伦的杰作。这部讽刺长诗是欧洲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具有使普希金赞叹不已的“惊人的莎士比亚式的多样性”。

诗人大胆而独创地运用英国人民的语言，描写了唐璜在那儿长大的、虚伪而守旧的封建君主制的西班牙，描写了海上遇险、饿死的恐怖、牧歌式的恋爱、奴隶市场、土耳其皇帝的禁宫、残酷的战争、俄国女皇的宫廷、伦敦的上流社会……诗人把主人公唐璜放在形形式式的情况下，从而展开了对十八世纪专制反动政体的讽刺性的评论——但按其内在意义说来，是与当时的生活有着直接关系的，讽刺的锋芒是针对着“神圣同盟”的暴政，私有者的“文明”，侵略战争和贪婪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



拜 伦

拜伦和他的《唐璜》

乔治·戈登·拜伦(一七八八——一八二四)，是十九世纪英国的一个伟大诗人。他受到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运动者以及法国革命者的理想所鼓舞，他在所写的诗歌中表现了被压迫受奴役的人民追求自由、争取独立的愿望。拜伦的创作和他当代的进步的解放运动，如早期英国工人运动，爱尔兰反对英吉利殖民王国的斗争，西班牙、希腊以及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互相呼应的。拜伦自己后来就是意大利烧炭党的一名成员。因此拜伦的作品在当时是不受英国反动统治阶级欢迎的。但是在工人中间却恰恰相反。恩格斯在一封伦敦来信中说：“读拜伦和雪莱的作品的几乎全是下层等级的人”。恩格斯又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

拜伦诞生于一七八八年，他是一个英国贵族的儿子，母亲是一个富有的苏格兰人的嗣女。诗人的父亲约翰·拜伦是一个道地的纨绔子弟，他很快就把妻子的财产挥霍一空，然后撇下她和

孩子出走了，最后死在法国。拜伦早年和母亲一起住在苏格兰，过着贫困和孤单的生活。拜伦从小就热爱苏格兰多山的自然，苏格兰朴实的农民生活在他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十二岁时就开始写诗。从哈罗中学毕业以后，他就进入剑桥大学念书。不论在中学，不论在大学，拜伦特别喜欢历史和文学。拜伦于一八〇九年在大学毕业。大学毕业以后，他由于对英国国内社会环境深为不满，就出国旅行。从一八〇九年到一八一一年，他游历了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回国以后，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在一八一二年发表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第二章，这首长诗开头两章的发表不仅引起当时英国知识界普遍的注意，而且还远远及于国外。拜伦的政治活动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拜伦早在一八〇九年即以英国贵族资格进入上议院，但是一直到他从国外旅行回来之后才真正开始政治活动。他在议会里发表了好几次演说，坚决反对英国当局的反人民的政策。但拜伦后来却觉得这种议会里的空谈除了浪费唾沫与时间以外，什么用处都没有。就公开表示不再在议会里发表演说了。

拜伦既然摆脱了议会的空谈活动，他就集中力量写作政治讽刺诗，通过这些政治讽刺诗猛烈地抨击了英国当局的反动统治。英国统治阶级因此对拜伦当然十分痛恨。他们千方百计对拜伦进行造谣中伤，挑拨拜伦的妻子和拜伦离婚，最后拜伦不得不离开祖国出奔异国。一八一六年他居住于瑞士。在瑞士他和雪莱相识。两位诗人对英国资产阶级、贵族政府抱着同样的仇恨，对自由怀着同样的向往。一八一六年秋，拜伦来到意大利。不久就和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意大利烧炭党有了联系，而且积极参加

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由于意大利人民与奥地利反动统治的力量当时相比还很悬殊，加上烧炭党本身的庞杂、革命目标不明确、革命策略的游移不定，起义终于宣告失败。拜伦不得不跟着烧炭党领导人之一，甘巴一家人出走。一八二三年他来到希腊。拜伦早对希腊人民所进行的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表示十分关切。来到希腊以后，拜伦捐输出他所有的钱财，帮助希腊人民组织武装。拜伦的最后数月是在希腊度过的。拜伦站在希腊解放战士的最前列，在军事指挥与解放运动的组织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就在这场解放斗争如火如荼开展之时，他却不幸因病去世，当时只有三十六岁。

拜伦展开政治和文学活动的时期，正当反动的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神圣同盟”成立前后。当时希腊、意大利还没有获得完全独立。明的暗的参加神圣同盟的国家正运用一切力量镇压国内和国外的革命。英国形式上虽然没有参加神圣同盟，但是英国政府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支持它的反动政策。神圣同盟各国的反动统治激起了拜伦的极大愤慨。拜伦的战斗热情，他的不妥协精神，他的诗作中所发挥出来的强大的讽刺抨击的力量，——就来自反对神圣同盟各国反动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

拜伦在诗歌中除了猛烈抨击国内外的反动统治以外，同时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控制英国诗坛的“湖畔派”诗人华茨华斯和骚狄之流。拜伦指责华茨华斯把诗的题材局限于一些平凡浅薄的观念，而且还要用装腔作势的语言把它表现出来。这些尖锐的批评立刻激起了华茨华斯他们的狂怒，他们在《爱丁堡评论》中大肆反攻，他们认为拜伦的诗是对神和人类的亵渎，既不生

动，又缺少幻想，无非是“刚离开大学的青年所写的歪诗而已”。他们劝拜伦还是珍惜珍惜时间，不要再写诗。拜伦自然不会把这荒谬的劝诱当作一回事，而是报以更厉害的回击。

拜伦在他的讽刺中不但反对了反动的浪漫派，而且也反对了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学。他坚决反对他们否定法国革命而把中世纪理想化。拜伦和华尔特·司各脱之间的论争，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拜伦责备司各脱把封建主的纷争诗情化，对封建骑士的伪善的道德抱着妥协的态度。后来，司各脱和“湖畔派诗人”分手，这和拜伦的诤言是有关系的。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是拜伦在各国游历的结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是对欧洲的过去和现在的评判。它不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记下了明朗的、充满感情的个人印象，感叹那“奇突的峰峦，结满果实的山谷”，而且还对大规模的历史事件作出了批判的概括。他诅咒侵略，诅咒奴役，他歌颂争取独立自由的人民。他向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的人民叫喊：

世世代代做奴隶的人们，你们知否
谁要获得解放，就必须亲自动手，……

他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英国人就原谅了本国政府的伪善姿态，海盗行径，他愤慨地申斥：

抢劫一个多难国家的最后一批盗党，
是自由的不列颠，海上女皇的儿郎。

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例如象丹麦的勃兰戴斯，他解释拜伦的巨大诗才以及同仇敌忾的战斗激情，是由于他的遗传，是由于他的祖先“喜欢冒险”，“放荡不羁”。这是一种曲解[●]。诗人所处的当时的现实生活和斗争无疑是最大的源泉。当拜伦看到拿破仑蹂躏过的西班牙美丽的国土，他自然就没有心思去写象“湖畔派诗人”所写的“在湖边，在树下，在微风里颤动舞蹈”这样的诗句了。

《唐璜》是拜伦创作中的顶峰。诗人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表现的讽刺激情，在《唐璜》里得到了更深更广的发挥。《唐璜》原计划有二十五歌，但拜伦写完第十六歌以及第十七歌的少数几行后，就因病去世了。根据拜伦的书信所透露，主人公除了已经历一些变故，到过一些国家以外，还要继续到一些国家游历，最后他将参加法国革命，在法国革命中牺牲。法国革命应该是史诗的最高潮。拜伦是希望通过这个诗篇向读者揭露欧洲历史中一个动荡时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矛盾。

欧洲古典作品中常常以唐璜作为主人公，但是拜伦笔下的唐璜和传统中的恶魔式的唐璜，除了他的姓氏以及西班牙的出身以外，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在拜伦的长诗中，唐璜是一个普通平凡的贵族知识分子。作者通过主人公各种不同的遭遇，揭示他的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同时也有力地揭露他的弱点和错误。唐璜这个人物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环境的产物。唐璜的性格有好些地方和十九世纪欧洲资

● 参见勃兰戴斯：《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第四册《英国的自然主义》。

本主义社会中频频出现的“多余的人”相似。在唐璜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中世纪道德的残余正和资产阶级的“新道德”奇怪地纠合在一起。当时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以及各个阀阅世家的一家之长们竭力压制年轻一代人头脑中的新思想的冒头。唐璜的母亲对儿子的教育就是煞费心机的。她只给他阅读规劝文，训诫录，弥撒书，把他的时间一半安排在教堂中，一半安排在她的“膝下”以及在教师的课桌前度过，“要使他的教养完全合乎道德”。然而当唐璜的母亲正在向人夸耀，“她的少年哲学家已经变得如何正经，如何沉静，如何稳健”的时候，他却受到了邻居朱丽亚的引诱。然而这正是封建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结果。唐璜本身既缺乏坚强的信念，中世纪的旧道德残余又不是他所能接受的，他喜欢幻想，他想“那月亮的圆周可以有多少英里”，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排他自己，他也看不到任何问题背后所隐藏着的东西，这样就自然不能抵抗第一次的诱惑。

但是，唐璜的性格是随着包围着他情势的不同而逐渐有了改变的。离开西班牙以后在海上的遇险，使他开始看到人生社会的一角：受饥饿威胁的人“眼睛里渐渐显出吃人者的贪欲”，人们用抽签办法决定先吃哪一个人。“那些在吃时显得最狼吞虎咽的人都发了疯”，他们——

吐沫，打滚，为奇异的痉挛所折磨，
喝着咸水象喝着山溪的水一样，
撕扯，磨牙，号哭，尖叫，咒骂，
象鬣狗般笑了一笑，就绝望地死去。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一个父亲“从一块破布里挤出了一点雨水，滴入他将死的孩子的嘴里”。当做父亲的终于发现这孩子“直挺挺地躺在他的胸头，脉搏和希望都已断绝”的时候，他“自己塌倒下去，哑口而全身发冷”。另一个父亲，当自己的孩子已经死亡以后，他就“不落一滴眼泪，不作一声呻吟，跳入海中”。在这场祸变中，唐璜的感情变得深沉起来了。他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吃人，“只顾嚼着一片竹头”，他一度还用手枪阻止水手喝酒。

后来唐璜得到了海甸的援救。在孤寂的环境中，他渐渐爱上了这个海盗的女儿。他们在海滨浅滩，幽静的山洞，发光的卵石上，黄昏红霞中度过了愉快的日子。但是他们的爱情基础却是海盗兰勃洛这个“捉人的渔夫”所安排好的僵硬的社会关系。不顾他的温柔的女儿要用死来改变父亲的主意，兰勃洛还是活活的把他们分开，把唐璜送到了奴隶市场去。于是唐璜再一次挨到现实生活的迎头痛击。

唐璜在奴隶市场上，看到人们把他们当做“一头牛，一头驴，一头羊”似的论价，争吵。后来唐璜被人家买到土耳其苏丹的宫廷里，在那里他遇到无耻王妃的求欢，他拒绝了，就带着同伴和两个宫女一起逃跑。接着唐璜参加了正在入侵土耳其的俄国军队，一时竟成了俄国强盗的帮凶。然而在伊斯美尔城下，他却看到土耳其苏丹和他的五个儿子奋不顾身，拚死抵抗俄国人的入侵，宁愿“把自己的胸膛向俄国人的枪尖扑去”，而决不甘心束手投降；后来唐璜又在连天的炮火中救下了一个土耳其人的孤儿，感到了救人的快乐。总之，每一种新的情势都在唐璜的性格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使他的思想起了相应的震动。但是唐璜性格的发展也不是一直线进行的。他很容易受环境的俘虏。例

如，当入侵土耳其的军事行动结束，他“因功”来到俄国女皇的宫廷，他又乐意成为女皇陛下的宠人了。唐璜害了病，才使他得到女皇的怜悯，把他派到英国做特使，脱出了这个环境。但是英国的生活似乎也并不怎样有利于他的性格的发展。当长诗突然中止的时候，唐璜还是沉湎在伦敦的“大千世界”里。如果按照拜伦的预定，长诗的发展，要以唐璜投身法国革命为结束，那么我们的主人公还得经历一些不同环境的磨炼，才会发展到这一步。

然而，应该指出，拜伦笔下的《唐璜》并不是以专门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作为中心任务的。在拜伦的长诗里，对唐璜的活动的描写，有时却不过是许多议论借以引伸、发挥出来的由头。拜伦常常喜欢在描写唐璜的活动和遭遇之余，插入大段的议论。他或者尖锐地批评当时英国和欧洲其他各国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对弱国的压迫和欺凌，或者对当时的哲学思想、文学现象发表精辟的议论。拜伦自己就在一封给出版商的信中说过：“《唐璜》的第五歌绝对不是最后一歌，相反，还只是刚刚开始哩。我打算让他周游欧洲，要他经历种种围城、交战、冒险的生涯；最后叫他参加法国革命。究竟要写多少歌，我还不清楚……我要把他在意大利写成一个爱奉承女人的骑兵，在英国把他写成惹得人家离婚的罪魁祸首，在德国写成象维特一样的多愁善感的青年；目的都是为了我能够嘲笑各国社会可笑的方面……”

但是拜伦虽然时常离题旁涉，他的议论和《唐璜》的思想内容以及长诗的结构还是保持统一的，读来一点都不觉得牵强、不自然。

拜伦在《唐璜》中的抨击、讽刺、嘲笑不仅是对英国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现实而发，而且也是对所有欧洲各国的专制统治而发

的。拜伦对当时到处侵略兼并，到处挑起战争的俄国、普鲁士等国同样作了最无情的揭露。在希腊争取摆脱土耳其奴役的斗争上，拜伦的同情自然是在希腊人民一边的。然而当俄国人入侵土耳其，拼命进行烧杀掳掠的时候，拜伦就歌颂了土耳其人民对俄国人的英勇抵抗：

那城市被占领了，却不是双手奉上的！——
不！没有一个伊斯兰教徒交出了刀剑：
鲜血可以迸涌出来，好象多瑙河的水
在城墙边滚滚而流；但在言语和行动上
决不承认对于死亡或敌人有任何畏惧……

拜伦拿入侵者同“最凶的野兽”相比，他觉得，比起凶恶的哥萨克人来，——

熊是开化的，狼是和善的……

拜伦不仅在长诗中谴责了这些欧洲极权国家的穷兵黩武，而且一针见血地剥开了这些国家的掠夺性质。他把这些国家同海盗兰勃洛相比。他这样地讽刺说：

不要对他（指兰勃洛）筹钱的办法感到奇怪，
虽然他向每个国家的国旗诈取钱财，
因为只要把他的称号改为“首相”，
这就不过是捐税罢了……

拜伦在《唐璜》中也没有放过那些“湖畔派”诗人——也就是那些与拜伦为敌的反动文人。他在这部长诗的一开头，就对骚狄们发出比以前更尖锐的讽刺。他讥刺骚狄“摇身一变，变为王党的一员”，只知道“死守住自己的一伙”，“在湖边出没”，只知道胡诌一些谄谀的歌“端奉给王上，或是摄政王去品尝”。他骂这些诗人都是贪图黄金和桂冠两者兼得的卑鄙家伙。他这样评论华茨华斯、珂洛立琪、骚狄三个人道：“第一个狂妄得不可救药，第二个麻醉了，第三个是那么乖僻而爱说大话。”拜伦对这些诗人的反感，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从内容到诗的形式，拜伦都是和“湖畔派”诗人形成对立的。他把文学从给贵人消遣解闷提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境界。拜伦也在《唐璜》中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反对贝克莱主教的主观唯心论。拜伦尖刻地嘲笑贝克莱道：“当贝克莱主教说‘没有物质’时，我倒极高兴把一切物质，甚至于石头、铅，或者金刚石都行打碎，来发见世界是一种精神……”拜伦对于社会，对于政治，对于文学、哲学的见解和态度，差不多都在长诗里得到表现。他不但抨击了封建、贵族社会，同时也揭发了“银行家，是我们今天的寡头政治”，他们的资本，是“我们的法律”。这比起他的同时代诗人的思想境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突出的表现。

自然，拜伦的诗歌由于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失败，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熟的时期产生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就暴露出一个矛盾。他一方面对劳动大众的解放愿望抱有同情，对本国和欧洲的统治阶级的自私的政策表示最大的愤慨；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对事物的某些看法，也还不免带着虚无的个人

主义的情绪，有时也还不免流露出一种失望。他知道“旧的破灭，新的浮现”，但同时他又会如此感叹：

人生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
就象在昼夜之交一颗星徘徊于天边。
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知道多少！
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我们更不知道！

但是这是受到历史的局限，这是出于拜伦的愤激。这种拜伦式的哀愁并不能掩盖他的乐观主义的本质。拜伦所诅咒的正是我们世世代代所诅咒的。拜伦所歌颂的大体上也是我们现在应该肯定的。我们这一代置身在人类社会新阶段的人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是容易拂去拜伦式的哀愁，把拜伦诗歌中的美好的东西批判地继承下来的。

辛未艾

一九五八年二月初稿
一九七八年四月修改

断 片

書于詩人手稿第一歌的背面

我求求天，但願我是这么多的肉体，
就象我是这么多的血、骨、骨髓、热情、情感——
因为至少过去的事情已經过去，
至于將來——（可是我寫这个时头脑有些晕眩，
由于今天我喝了一个大醉，
現在我就仿佛站在頂篷上一般）
我說——將來是一件嚴重的事——
所以——天呀——快把葡萄酒和苏打水拿來！

獻　　辭

包勃·騷狄！●你是一個詩人——桂冠詩人，
而且是全民族的代表；
固然你終於搖身一變，成為王黨的一員——
你這種情況近來倒是很普遍；
請問，我的“史詩的叛徒”，你在干什么呀？
同着那班“湖畔詩人”在湖邊出沒么？
他們是一群善歌的人物，在我看來
就象“一塊餡餅里的二十四只画眉；

二

“這塊餡餅一被剖開，它們就拉着嗓子唱”
(这旧歌和新喻用在这里倒適宜)，
“一盤精美的食品，可以端奉給皇上”
或是攝政王去品尝，他就喜欢这类东西；